

大陆新村 9 号是鲁迅住得最安稳的一处，也是鲁迅在上海最后一次搬家。在萧红的记忆中，鲁迅家没有沙发，全是硬椅子。鲁迅在写字台跟前坐的，也是一把木质的圈椅。鲁迅休息，或者琢磨稿子的时候，用的是一把破旧的藤椅。

至左写着三个字：“景云里”。景云里为石库门里弄住宅，淡黄色字体既未剥蚀也不鲜亮，颇有些历史痕迹。

1927 年 10 月 3 日，鲁迅和许广平坐船到了上海，两人先是入住在共和旅馆，5 天后就搬进了景云里 23 号。那时，景云里已经住有鲁迅的弟弟周建人，以及文化人士茅盾、叶圣陶等人。据许广平回忆：“当有许多人等，都云集在这里，颇不寂寞。”

景云里这条里弄有如复杂的毛细血管，步入其中，偶然有一二老者进出。鲁迅居住过的 23 号在左边第一个“通道”里。现今杂物自行车无序摆放，也有人从门里出来，居民每每见有人来访，虽也上下打量，但并不惊讶。

据史料记载，鲁迅在景云里居住的两年半时间里，就在这一排房子里搬迁过两回，23 号虽位于最深处，但邻居每日打麻将、唱小调的噪音让他无法写作工作，于是又搬到中间位置的 18 号，后因仍然不堪其扰，又搬到 17 号。直至 1930 年 5 月迁居拉摩斯公寓。

拉摩斯公寓是个西式洋房，砖红色大楼便是当年日军陆军司令部。公寓正房里，唯一的一个中国人就是鲁迅。这个房子之前的主人是一个日本海员，鲁迅是通过他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租下来的。“日本攻占上海时，有一次房子窗台被榴弹击中，幸好当时鲁迅外出，未受伤。”

鲁迅很少说起房租的价格，但他会记下“顶费”。那时，租房子的“顶费”，类似于现在人理解的押金。你交了“顶费”之后，就获得了这个房子的无限期使用权，甚至还可以把这个房子再转租出去。

景云里的“顶费”50 元，拉摩斯公寓的“顶费”是它的 10 倍，据记载，鲁迅在景云里 23 号的“顶费”一直没退。因为鲁迅搬出后，那个房子鲁迅让给了柔石和他的小伙伴们，直到 1931 年春节柔石牺牲，年轻朋友也搬出，那 50 元的“顶费”才退给了鲁迅。

大陆新村 9 号是鲁迅住得最安稳的一处，也是鲁迅在上海最后一次搬家。在萧红的记忆中，鲁迅家没有沙发，全是硬椅子。鲁迅在写字台跟前坐的，也是一把木质的圈椅。鲁迅休息，

或者琢磨稿子的时候，用的是一把破旧的藤椅。

站在鲁迅卧室里，会看到一块表，表上的时间永远停留在 1936 年 10 月 19 日清晨 5 点 25 分。有人疑惑，在北京置办了两套房子的鲁迅，一套是八道湾的房子，一套是西三条的房子，为何在上海没有置办房子，反而一直租房。

李浩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鲁迅在上海不是不想买房，而是没打算长住。鲁迅到上海之初，只是怀着“过客”心态，先住下来歇息一下，再决定去向。1927 年 12 月 19 日致旧友邵文熔信中，鲁迅坦言：“‘弟’从去年出京，由闽而粤，由粤而沪，由沪更无处可住，尚拟暂住。”

没想到，一到上海的鲁迅便被友人们的热情包围。特别是暂居之所离茅盾等作家相近，常有聚谈机会，而且他很快就投入到创作、编辑和文艺活动当中。这让鲁迅感到一种找回自我的感觉。上海就这样无意中成了鲁迅最后的栖息地，一个让他再一次被推到文化前沿的地方。

旧门牌与无题诗

《前哨》的展览上，有一个墨书“镰田诚一”的门牌，这块门牌呈长方形，本色无漆，历时虽久，但风雨之迹不甚明显。周海婴《鲁迅与我七十年》一书中，周建人回忆，这块牌子看起来不算旧，因当时只在室外钉了个把个月，时间不长的缘故。

革命年代，这块门牌曾发挥过“避风头”的重要作用。

1931 年 1 月 16 日，柔石到拉摩斯公寓看过鲁迅。第二天，柔石在租界东方旅店开会，与 29 个同志被一起抓捕了。柔石是鲁迅的学生，两人曾共创期刊《朝花》，再加上都喜欢木刻，使二人亲如父子，单《鲁迅日记》载及的来往就有

横眉冷对千夫指

俯首甘为孺子牛

鲁迅

